

黄普华 / 编著

植物名称研究 专集



中国林业出版社

黄普华 / 编著

植物名称研究
专集

中国林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植物名称研究专集/黄普华编著.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038-5502-3

I. ①植… II. ①黄… III. ①植物—命名法—研究 IV. ①Q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275 号

责任编辑 牛玉莲 田 苗

电 话 83228701 83220109 **传 真** 83220109

出版发行 中国林业出版社(100009 北京西城区德内大街刘海胡同7号)

E-mail:jiaocaipublic@163.com 电 话:(010)83224477

<http://www.lycb.forestry.gov.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印 张 30.5

字 数 700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次

黄普华教授科学技术传略（代序）	1
第一部分 植物中文同名探源、形态区别及其分布	17
第二部分 植物英文同名探源及其形态区别	335
第三部分 植物命名题解	413
附录：	
黄普华教授出版物目录	465
黄普华教授部分获奖证书	470
黄普华教授教学及研究工作照片	476
黄普华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名单	484

黄普华教授科学技术传略（代序）

黄普华教授，中共党员，长期从事林业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在教学上，他主张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并在教学实践中始终贯穿这一指导思想，因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他主持并参与的教学研究《教学改革要立足于学生能力培养》获1989年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他主讲的《树木学》1990年被学校评为首批5门优秀评估课程之一。在科学研究方面，他致力于中文版《中国植物志》（FRPS）和英文版《中国植物志》（FOC）的编研工作。他参编的中文版《中国植物志》第31卷、41卷、45卷和英文版《中国植物志》第7卷、10卷已相继出版。基本摸清了我国维管束植物的家底，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和科学依据，为国家持续地开发生物资源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参加编写的中文版《中国植物志》获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等奖。英文版的《中国植物志》是由中美植物学者合作，被我国正式批准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并得到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这项编研实为中文版《中国植物志》的增订、修改版或第二版。英文版《中国植物志》是与全世界专家合作共同完成的，是《中国植物志》走向国际的一个里程碑。

20世纪90年代，他通过我国驻德国参赞推荐参加由德国慕尼黑大学森林植物系教授Peter Schütt等人组织，全世界有100多位学者参加编写，由德国Ecomed出版社出版的《Enzykiopädie der Holzwächse》（树木大百科）图书的编写。他负责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些重要树种的撰写。此书于2003年先后完成出版。由于他工作较出色，1998年曾被P. Schütt推荐为《Virgin Forests》杂志的海外编委。在植物分类研究方面，他与杨衔晋教授联合命名的植物新分类群57个，其中新种30个，新订正种2个，新亚种1个，新变种11个，新订变种9个，新变型2个和新订变型2个。他著述颇丰，发表和出版图书90篇（部），其中编著20部、译著2部。1987年黄普华教授被林业部授予1986年度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取得这些成就的背后，凝聚着他大量的心血。让我们循着黄普华教授的工作、生活轨迹做一番追踪探寻吧！

一、执著的追求 无悔的选择

1932年10月1日，黄普华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原为县）广海镇那朗东昇里村的一个华侨家庭。台山市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广海镇位于台山市最南端，是一个海滨小城镇，也是一个小渔港。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很多居民，为了谋生，不得不告别亲人，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寻求生路。他的祖父黄业栋和父亲黄球扬同这里的居民一样，带着他的长兄，告别亲人，颠沛流离，漂泊在异国他乡。他自幼就和祖母、母亲及弟弟在国内居住。1947年秋，他的兄长从菲律宾回国，为他办理出国手续，准备带他出国谋求发展。但他坚决不去，毅然决定地选择在国内

读书,将来要当一名科学家,报效祖国。他这一思想,自幼来自祖母的灌输。他的祖母是个裹脚妇女,为人善良,和蔼可亲,乐于助人。虽然她不识字,没有文化,但她深知求学的重要,经常鼓励和教诲他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祖母的言教,深深地影响了他人生的确立。渴望求知的他牢牢记住祖母的教诲,一刻都没有放弃学习。正是凭着他的执著和坚毅,带着那始终如一的信念和梦想及祖母的希望,1949年春,他考入了广东四邑华侨中学高中部(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广东华侨中学),这是一所省立的华侨子弟学校。新中国成立前,学生几乎是清一色华侨子弟。新中国成立后,增招不少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归国的华侨学生。他在校学习努力,工作积极,1951年被选为学校学生会秘书长(当时学生会主席是翟仲佳)。他们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组织全校学生参加当时街道的各项政治活动和宣传工作,如“三反”、“五反”等宣传活动。1952年秋,他高中毕业。他通过参加全国统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享有“东方莫斯科”美称的北国哈尔滨的东北农林学院。从此,他告别了温馨的家庭,从南国广东来到北国哈尔滨,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也为他今后的人生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在东北农林学院,他被分配在林学系林学专业,这是一个由浙江大学森林系和沈阳农学院等院系新组建的系和专业。在大学4年的学习生活中,他刻苦钻研,发奋读书,汲取新知识,探索新领域,基础扎实,成绩突出。学校的图书馆和教室都留下了他千万个脚印、无数的汗水和难忘的夜晚。他为人豁达、开朗、坦诚。在学习上肯帮助同学,同学有问题时,也愿意向他请教或与他研究。对同学提出的疑难,他都根据自己所知,不厌其烦、毫无保留、认真详细地向同学解答。在同学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因此,在班上同学们很早就称他为“黄教授”。他是班上学习的佼佼者,毕业时被评为“全优生”。在毕业文凭上加注“全优生”字样,受到学校的奖励。4年的大学时光似乎在弹指一挥间中悄悄而过。他毕业了,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了。尽管教师职业平凡甚至平淡无奇,但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留校执教。他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每一位渴望求知的人们,使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让他们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为建设祖国做出贡献。就这样,他成为了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园丁,光荣的人民教师,开始了他新的漫漫人生路。他也为自己无悔的选择深感自豪。

二、教书育人 言传身教

1956年秋,黄普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做了院长杨衍晋教授的助教和教研室秘书。两年后即1958年8月,由于他工作出色,成绩突出,在同期毕业留校工作的16名同学中第一个被提升为讲师。从此,他开始独立主讲《树木学》及《植物分类学》课程。他深知做一名教师除了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外,还要有过硬的教学基本功。为此,他拟定教案和讲授提纲,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充实教材内容。他认真备课,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深入浅出,明白易懂,认真对待每一节课,尽可能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每一位求知的学生。他业务过硬,知识广博,深受学生的好评和爱戴。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时刻牢记这一天职,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认为,作为任课教师能和学生接触最多的就是

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通过平时的教学活动,结合专业课的特点,适时适度地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而且是别人无法取代的。因此,他无论是在本科生教学还是在研究生教学中,首先他要综览教学课程,挖掘、提炼教材深处的思想性内容,融思想教育于教学中,适时适度地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多年来,他在讲授《树木学》课程时,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不仅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向学生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

一是在绪论中讲透学好本课程对一个林业工作者的重要性。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和学习态度的教育,使学生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多年来,凡是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学习兴趣高而且认真,成绩也较好。

二是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他认为《树木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在教学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许多基本观点,如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遇到这些观点的内容,他就很自然地讲透这些观点,不是牵强附会地联系。例如,他讲到如何确定植物分类系统位置时,他强调不能孤立地以某一性状为依据,而要着眼于性状的总体,全面综合地考察,并与其他植物作深入的对比研究,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结论。这样结合教学内容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是容易被学生接受的。他还经常以我国森林类型多样、植物种类及资源极其丰富的事例,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更加热爱祖国,立志报效祖国。

三是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他善于利用历代文人墨客,借植物比喻做人的高尚情操的诗句,三言两语地向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例如,他在79级《树木学》教学中,当他讲到木犀科中的茉莉花时,他把人们赞美茉莉花的两句诗“不求花间争芳艳,只留幽香在人间”,抄录在黑板上,要求学生要有茉莉花的精神。在我们一生中,不要争名夺利,而要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学习,勤勤恳恳工作,为振兴中华多做有益的贡献,把美好留在人间。还有当他讲到竹子的时候,又很自然地借人们咏竹“生来刚且直,巍巍风中立。不畏霜雪寒,更有凌云志。清廉兼有节,虚心人敬之。他日成良材,为人乐捐躯。”的诗句来比喻人们应有的刚强、正直、清白、廉洁、虚心的高尚情操及有气节、有壮志凌云、有乐于献身的优秀品质,来勉励学生。尽管这些都是三言两语,但恰当地结合教材传授给学生,学生们印象是很深的。特别是优美的诗句,学生们都端端正正地抄录在笔记本上。有的同学还以此写日记和文章,表示要做一个有高尚情操和勇于献身的人。

作为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给学生,同时,还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灌输于知识传授,寓德育于智育之中。这是他数十年来教书育人的基本特点和根本途径。

然而,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导师的一言一行犹如一部活生生的人生教科书,深深地印在学生的心灵深处,给予学生激励与启迪。导师对学生的熏陶感染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教育方式。作为导师,应当时刻注意榜样的作用,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要求自己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真正做到“有诸己而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教书育人中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且这也是教师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备

前提。

为了使自己具有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备前提，他处处事事都注意导师的榜样作用。他在审阅研究生论文时，总是逐字逐句认真审阅，并把学生叫到身边，一边解释为什么要这样改，一边进行修改。从不敷衍了事，严把论文质量关，以自己严谨治学的态度来影响他们，熏陶他们。尽管这些可能不会立竿见影，但它是潜移默化，坚持下去，就会经常得到熏陶感染，其作用是深远的。

讲课是门艺术，除了有过硬的教学基本功外，还要有广博的学识。他虽然业务基础扎实，学识渊博，但他仍然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并经常以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的一段话：“一个教师，如果不精通自己的业务，如果不能给学生真正的知识，那么，不管你对学生多么善良友好，多么温存客气，你从学生那里得到的也只能是轻视。”来鞭策自己。在业务上做到精益求精，不断探索、追求，潜心研究教学方案。即便是他讲过多次的课程，每学期开讲前，他都依然要逐章逐节地重新认真备课。他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添加、补充教材内容，把深奥的科学知识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出来，治学严谨，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他热爱学生，了解学生，尊重学生，平等待人，以诚相见。对学生他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喻之以义，施之以爱，导之以行。既是学生的良师，也是诤友。在几十年来的教师生涯中，他记不清教过多少学生，但他的学子们早已学有所成。不少已成为林业专家、学者、教授乃至各级领导，国之栋梁。但这些学子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导师，仍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

他教书育人成绩显著，多次被评为教书育人先进个人。1982年出席黑龙江省高校教书育人经验交流会，会上被评为黑龙江省高校教书育人先进个人；1985年获林业部颁发的教书育人成绩显著荣誉证书；1990年获哈尔滨市高校教书育人先进教师光荣称号。

三、致力于教学改革 立足于学生能力培养

自1956年以来的4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黄普华先后为本科生和专科生开过《树木学》《森林植物学》《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概论》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过《高等植物分类学原理》《树木学专题》《植物学拉丁文》和《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等课程。他刻苦钻研业务，潜心研究教学方案。他讲课生动有趣，寓趣味于知识之中，便于学生记忆，使枯燥机械描述的植物分类课变成生动、形象、有趣的讲授内容。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激活学生对枯燥专业知识的兴趣。凡是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认为他讲课生动、形象、简明、易懂。仍有言犹在耳，记忆犹新的感觉。

他十分重视教材建设，教学法的研究和改革。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他伏在台灯下奋笔疾书，写下了除自编《树木学》教材和各种教学指导书外，还有《教学实验》《实习手册》《树木冬态检索表》《树木幼苗图说》和《拉丁语读音基本规律》等。1980年为研究生编写出版了《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概要》。同年他参编的全国高等林业院校试用教材《树木学》也在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教材可以说是全国唯一一本统编《树木学》教材，在全国林业院校教学中起了很大作用。鉴于我国幅员广阔，地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树种繁多，各地有差异，为了体现教材的地

方特点和更有针对性,他参与发起合编北方本《树木学》教材。由北京林业大学任宪威教授任主编,他任副主编的《树木学》(北方本)教材于1997年正式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南方院校也编有南方本《树木学》教材。从此,改变了一本《树木学》教材一统全国的局面。

他在平时还十分重视教学研究和总结,几年来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共7篇,详细记录了他在教学改革中的初步尝试和体会。

1982年,他主讲的《树木学》课,被学校确定为第一批15门教改典型课之一。此后,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教改之中。

在这次教改典型课改革中,首先他组织全教研室的教师,从培养目标、毕业生从事工作的性质、当今科学迅速发展对我们的要求、目前学生的现状以及本课程的特点等5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证,最后确定以立足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作为教改,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指导思想。

以传授知识为主,还是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的问题,在高等学校一直争论着。但他认为并一贯主张,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正处于日新月异,称之为“知识爆炸”的年代。知识不断更新,技术不断发展,这些是学不完的。在这样的年代中,教改应该怎么改?改什么?正像有些教师所说的,是给学生“饼干”(是指单纯的传授知识)?还是给“猎枪”(是指培养学生能力)?如果是给“饼干”,那么只能暂时填饱学生的肚子,他们就不要去取食,也不会去取食。在知识不断更新、代谢过程越来越快的年代里,他们免不了挨饿。如果我们给学生“猎枪”,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教会他们如何使用“猎枪”,他们将来在工作岗位上就会不断猎取新的知识,就不至于挨饿。授人以火,他将温暖一天;授人以燃火的方式,他将温暖一辈子。因此,他认为教改的立足点必须改革那种只重视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能力培养的传统教学方法。这是时代的需要和要求,势在必行。整个教改要贯穿这一指导思想,在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引导并教会学生如何正确地组织自己的思想,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体如何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他作了以下5个方面的改革:

1. 改革教学内容,加强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要加强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必须为学生提供进一步自学的基础。没有基础,能力是培养不起来的;有了自学的基础,平时又重视思考方法的指导,能力是可以逐步培养起来的。他为学生提供了进一步的自学基础,除了上述重视教材建设,为学生编印各种教学资料外,主要从精简教学内容入手,精简一些次要的、繁琐的、与实验课重复的内容。在原有教学学时不增减的基础上,把节省下来的1/5时间用来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以及其他教学环节,为学生提供宽厚的自学基础,并积极地进行思考方法的指导。

2. 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他认为讲课是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教师带领学生共同进行科学思维的过程。不能把学生单纯看做为接受知识的对象,使学生忙于光记笔记,处于无问题可思考的被动局面,妨碍学生思维发展。因此,他采取了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以代替原有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即采取自问自答或让学生回答的讲解方式,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和积极联想、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同时,采取对比、联系的讲解方

法,使学生从中受到逻辑思维和分析、综合能力的训练。这样的启发式讲课方法,他认为对培养和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3. 结合教学内容,加强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

在德育上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对教师来说,就是我们常说的教书育人问题。结合教学内容,挖掘、提炼教材深处的思想性内容,融思想政治教育于教学中,适时适度地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自我教育能力。在这方面,他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4. 改革实验实习,加强学生实际技能训练。

他首先注意正确处理验证书本知识与发展能力的关系。在实验实习验证书本知识的实践中,多提出问题,启发学生,多动脑筋,以养成学生对各种现象和问题有观察、思考、分析和探索的习惯。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过去那种认为实验实习是单纯为验证而验证的片面做法。其次,强调学生亲自动手,完成实验实习,突出学生实际技能训练和思维能力的培养。

5. 改革考试,加强学生智能的培养。

他认为,考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与学的问题,而且考试方法得当,命题得法,对学生学习方法上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学生能力和智力的发展。例如,出死题、偏题,势必引导学生死记硬背,不利于学生养成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的学风,妨碍学生智力的发展。相反,如果我们出的题目灵活,形式多样,在平时教学活动中又重视思考方法的指导,那么,就可以逐渐引导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发挥他们的智力。因此,围绕加强学生智力的培养考试的改革,他认为重点应放在考试方法和命题上的改革。

在考试方法上,他采取了理论与实践考试相结合的方法(评分比例为7:3),改革过去单一的课堂理论,重理论轻实践的考试方法。

在命题上,多在综合性和灵活性上下功夫。为了达到改革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和有利于学生能力培养的目的,在命题上,他还遵循这样两个原则:一是测验学生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的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的理论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要考查学生逻辑思维和分析、归纳、总结的能力。由于考试方法得当,命题得法,大大加强了学生职能的培养。

1983年12月,黑龙江省高教局,根据武汉会议和黑龙江省教育会议的精神,主持召开了全省高校教学改革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研究教学理论问题的大会。他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向大会报告了他的改革成果——《教学改革要立足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全文先后被刊登在黑龙江省高等院校《教学改革学术论文集》(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局,1983)和《黑龙江高教研究》1984年第一期。1989年,黑龙江省首次施行教学成果奖,该项改革成果被评为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0年,学校决定在全校开展课程评估工作。这是对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状况的一次自我认识;是促进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也是高校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担任的《树木学》课程,被学校定为首批33门试点评估课程之一。他接到任务后,组织了全教研室教师,认真按照学校的要求,对本课程开设条件、教学实施状况和教学效果三大方面,实事求是地进

行自查、自测和自评,并广泛听取专家组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较客观地全面地做出自评结果。做到边评估、边建设,促进了教学改革不断向前发展。最后,《树木学》课程被学校评为首批5门优秀评估课程之一。

此后,他以专家身份,被学校聘为学校课程评估专家组成员,参加每年学校的课程评估工作,在深化教学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1996年末退休为止。

1985年10月,他访问了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佐治亚大学、田纳西大学、华盛顿大学、俄勒岗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等7所大学以及纽约植物园等2个专门研究机关。到过美国农业部林业局,还考察了主要林区及林业托拉斯惠好公司及其属下的生产基地。历时2个月,美国东北部的大烟山等13个州也留下了他的足迹。这次出国访问,对他来说是丰富知识、学习经验的好机会。调研、考察几乎占用了他在国外的全部时间。在国外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知识,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回国后,他吸取了外国的好经验,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上致力于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深化教学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致力于《中国植物志》编研 为植物科学作出积极贡献

我国植物种类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资源十分丰富。编著出版一部《中国植物志》,反映我国丰富的植物种类及资源状况的基本文献资料,为我国植物学各分支学科研究提供信息、奠定基础,是我国几代植物分类学者共同的愿望,并为之艰辛努力。

195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启动了。1959—1963年间出版了《中国植物志》3卷,此后因故中断出版。1973年,中国科学院生物部在广州召开了《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研工作会议。要求逐步恢复《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我国植物分类工作者,无不为之受到极大的鼓舞,积极投入这一工作。

黄普华教授和杨衔晋教授先后共同承担了《中国植物志》第31卷樟科(Lauraceae)木姜子族(Trib. Litseeae Mez)、木姜子亚族(Subtrib. Litseinae Kosterm.)的黄肉楠属(*Actinodaphne*)、木姜子属(*Litsea*)和新木姜子属(*Neolitsea*)等属130余种以及《中国植物志》第41卷豆科山蚂蝗族[Trib. Desmodieae (Benth.) Hutch.]、山蚂蝗亚族(Subtrib. Desmodieae)的三叉刺属(*Trifidacanthus*)、山蚂蝗属(*Desmodium*)等16属70余种的编研任务。从此,他和《中国植物志》结下了不解之缘,数十年致力于《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

他善于安排好学校的教学工作。自1973年起到1983年这10年间,他除了在学校搞好教学外,每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室潜心研究植物标本,并先后辗转于全国各研究单位及大学各大植物标本室。清理了全国各大植物标本室的樟科植物标本以及向国外有关标本室借阅的模式标本。查阅了古今中外大量文献资料,悉心研究考证,鉴定了2万 multiple 份樟科植物标本,并进行了野外考察。在这10年间,他以一颗赤诚之心,把十倍的精力、百倍的干劲,都投入到工作中,废寝忘食,忘我工作,一心扑在事业上,使他无暇顾及家庭,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把家庭重担全部都交给他的妻子承担。他几乎踏遍祖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深山、丛林、大川和全国各研究单位及大学各大植物标本室,进行考察和

采集植物标本。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数据,保证《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质量,他不辞辛苦,历尽了风霜雨雪,酷暑严寒,风餐露宿,蚊虫叮咬,乃至地震的危险,调查资源,收集资料,采集标本,潜心整理,悉心研究。

樟科植物是我国南方常见的重要经济林木,在林业、轻工、医药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他承担的木姜子属、黄肉楠属等一些种类的果实含有丰富的油脂和芳香油,在工业上用途很大。我国樟科植物种类多,有 20 余属 400 多种,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分类难度较大,有些属只看到果实,没有看到花,不易区别,如木姜子属与山胡椒属。而有些属只看到花,没有看到果实也不易分辨,如楠属与润楠属。加上有些是雌雄异株,所以过去鉴定的标本,在分类上存在不少错误和混乱。在研究工作中,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每一个植物分类群名称、形态和各个器官,都经过认真细致研究和考证。他对美国人 C. K. Allen 发表的四川木姜子分类群的名称考证和澄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41 年,美国人 C. K. Allen 根据我国四川灌县青城山采集的标本 (C. S. Fan et class 139) 为主模式,发表一种四川木姜子 (*Litsea szechunia* Allen in Journ. Arn. Arb. 22: 18. 1941)。在该种下还引列几号标本: Fenzel 507 采自秦岭地区雄花标本;汪发瓚 23151 号采自四川峨眉山;俞德浚 705 号采自四川峨眉山和蔡希陶 55967 号采自云南。经他详细研究,核查现存这些标本,发现不属同一分类群,而是包括几个种,甚至还有不属于木姜子属的。其中秦岭地区 Fenzel 507 号标本与四川灌县青城山的 C. S. Fan et class 139 号标本,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嫩枝无毛,叶片下面和叶柄被白色绒毛,果梗细长,果实较大;而后者嫩枝密被绒毛,叶片下面和叶柄被黄色绒毛;果梗细短,果实较小。显然,这两者不能混合为一。他和杨衔晋教授经研究后,已将秦岭地区 Fenzel 507 号标本另立新种,命名为秦岭木姜子 (*Litsea tsinlingensis* Yang et P. H. Huang in Act. Phytotax. Sin. 16 (4): 47. f. 7. 1978), 以示和四川木姜子区别。其余汪发瓚 23151 号四川峨眉山标本,经他们核定为宝兴木姜子 (*Litsea moupinensis* Lec.); 俞德浚 705 号四川峨眉山标本,应为钝叶木姜子 (*Litsea vcitchiana* Gamble)。此两号标本均非为四川木姜子。而云南蔡希陶 55967 号标本,并非是木姜子属,而是山胡椒属的香叶树 (*Lindera communis* Hemsl.)。使混淆 30 多年的分类群得以澄清。

豹皮樟是长江流域一带极为普遍的灌木树种,可是长期以来,学名使用极为混乱。过去多把它置于黄肉楠属称做扬子黄肉楠 (*Actinodaphne lancifolia* var. *sinensis* Allen), 其实本种具有正常无总梗的伞形花序,苞片宿存交互对生以及叶片散生等特点,应属木姜子属。根据对标本的详细核对及参考 Nakai、Allen 及 Kostermans 等人对 A. H. Leveille 发表的 *Litsea coreana* Leveille 的一批标本分析,确认了 Kostermans 认为 *Actinodaphne lancifolia* (Sieb. et Zucc.) Meissn. 就是 *Litsea coreana* Levl. 是适宜的。因而豹皮樟的学名被他澄清为 *Litsea coreana* var. *sincensis* (Allen) Yang et P. H. Huang。同时也解决了日本人 Migo 1944 年发表的毛豹皮樟 *Iozoste hirtipes* Migo var. *lanuginosa* Migo, 澄清为 *Litsea coreana* var. *lanuginosa* (Migo) Yang et P. H. Huang。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数年研究、核对、考察,1978 年在《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樟科植物志资料(二)》的研究成果。此成果记录了他和杨衔晋教授联合命名的樟科木姜子属、新木姜子属和黄肉楠属新分类群

49 个,其中新发现新种 28 个、新变种 9 个、新变型 1 个、新订正种 2 个、新订变种 8 个和新订变型 1 个。不仅丰富了我国樟科植物资源的研究成果,而且纠正、澄清了长期以来外国人对我国在樟科植物分类上存在的错误和混乱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为编好《中国植物志》第 31 卷樟科植物奠定了科学基础。

1979 年末,他和杨衔晋教授研究的樟科黄肉楠属、木姜子属、新木姜子属新分类群成果获黑龙江省科技成果二等奖。翌年,《中国樟科植物的研究(二)》又获得林业部林业科技成果二等奖。他参编的《中国植物志》第 31 卷、《中国树木志》第 1 卷也于 1982 年、1983 年先后由科学出版社和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国植物志》第 31 卷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1985 年 7 月,他晋升为教授,1987 年被林业部授予 1986 年度林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在《中国植物志》第 31 卷樟科植物编研完稿的同时,他又立刻投入到《中国植物志》第 41 卷豆科山蚂蝗族 16 属植物的研究中。

豆科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个大科。他承担的山蚂蝗族,虽多为草本及灌木,但多数均能耐干旱。有些种类可作水土保持、固沙;有些种类可作饲料、绿肥;有些种类的根和叶还可供药用。又为蜜源植物。

他在整理研究过程中,发现过去对山蚂蝗属这一大类群,分类学家处理意见不一。有的把形态特征多样的一群组成广义的山蚂蝗属 *Desmodium*;有的根据特征各异单独分立为若干小属。经研究后,他同意一些学者将形态复杂的广义山蚂蝗属分成若干小属的意见,以便于学习和掌握。

他在《中国植物志》编研领域中发挥得淋漓尽致。1980—1981 年,他和杨衔晋教授又先后发表了《中国豆科新种》和《国产狸尾豆属的研究》两篇论文,记录了豆科新种 5 个,为编好《中国植物志》第 41 卷豆科奠定了科学基础。1995 年他参编的《中国植物志》第 41 卷豆科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自 1986 年他被中国科学院聘任为《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委至 2004 年编委会全部编研工作结束为止,在这 10 多年的编委期间,除了每年编委会开会时集体审阅稿件外,他始终尽职尽责,无怨无悔,保质保量,先后圆满提前完成编委会交给他的《中国植物志》第 20 卷 2 分册杨柳科,第 22 卷壳斗科、榆科和马尾树科,第 49 卷 1 分册椴树科、杜英科,第 42 卷 2 分册豆科(五)以及第 45 卷 3 分册卫矛科等 5 个卷册共计 219.2 万字的审稿任务。受到了编委会多次表扬。

1998 年初编委会提出尚未完成出版的《中国植物志》卷册,要求在 1999 年 10 月前一律完成。1998 年 3 月末,他受编委会委托,负责审修、整编第 45 卷 33 册卫矛科,并要求在 6 个月内完成,同时要达到付印出版程度。他接受任务后,起早贪黑,废寝忘食,争分夺秒,审修整编,补充近年来新发表的类群 33 种、3 个变种和几个图版。在 3 个月内便提前圆满完成任务,上交给编委会一次讨论通过,于当年交出版社,确保了该分册如期出版。受到了主编吴征镒院士的好评。

《中国植物志》全书共 80 卷,计 126 分册。它记载了我国 3 万多种植物 9000 余幅图版,是世界各国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科、属、种数量最丰富的一部巨著。它的编研工作经历了 45 年的漫长岁月,于 2004 年全部完成出版,实现了我国几代植物

分类学家的夙愿，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和科学依据；凝聚了我国几代植物分类学家的心血；记载了参编人员的辛勤劳动。《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获 200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五、源于生产 服务于生产的学科研究

《中国植物志》是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中生物系统分类和资源开发利用研究项目的子课题之一。黄普华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植物志》的编研，系统总结出我国植物分类研究成果，反映出我国植物资源状况，结合生产为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和科学依据。而且，他在 40 多年的树木学执教中，也不忘根据学科发展的方向，开展有成效的源于生产，服务于生产的学科研究。

过去，《树木学》课程和树木学的研究，单纯地偏重于树木分类，很少注意树木的生态和其他特性，更没有联系生产实际。40 多年来的教学生涯，使他深深认识到学科要发展，必须充分体现这门学科密切结合生产实际，为林业生产服务的方向。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深入研究树木分类，在正确鉴定树木种类的基础上，选出速生、优良品种及其最好的生态类型，是最好的联系生产，服务生产的项目之一。

多年来，在学科研究领域，他都本着源于生产，服务于生产的原则进行选题，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他主持并自始至终参与的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兴安落叶松速生、优质类型的研究”课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初期，他在大兴安岭林区调研时就听到林业工人反映，兴安落叶松木材有红茬和白茬之分（即红色和白色之分）。不仅材色有异，而且材性及加工性能也有不同。他觉得这个问题，要从林业生产实际需要出发，立题研究，为林业生产提供一个优良类型意义重大。由于当时他承担的《中国植物志》编研任务较重，未来得及立题申请，但他一直惦记在心里。直至 1992 年才开始向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立题申请，并得到资助研究。为了有一个调查研究基地，他与大兴安岭森林经营局合作，并在该局的大力支持下，正式选定了大兴安岭地区的新林、呼中两个林业局作为大兴安岭东部地区调查观察采样的研究基地；在牙克石林管局，选定了阿里河、阿龙山两个林业局作为大兴安岭西部地区调查研究基地。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和年轻人一样，深入到大兴安岭林区进行调查、取样、研究、分析。

通过野外调研观察，室内实验分析，最后确定并选出白材兴安落叶松（白茬）[*Larix gmelinii* f. *chloracarpa* (Miyabe et Miyake) P. H. Huang et L. H. Zhuo] 是一个速生优质类型。该类型的木材在材色参数与红材型参数上确实不同；在物理力学性质、加工性能、适用范围、生长速度、种子发芽率等方面，均优于红材落叶松；在材质的某些性能指标上还优于樟子松。这一科学发现，为生产、销售和使用部门等单位在使用兴安落叶松木材增加企业效益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过去对红白两种类型的兴安落叶松，都是混合销售加工使用。在干燥、切削、胶拼、零部件结合、涂饰等加工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干燥系数、硬度、颜色的木材混合在一起加工，必然增加干燥质量差、胶接不牢、木制品易变形以及颜色不均匀等加工缺陷。他们的研究成果，可根据两种木材各自的特点，将其分别销售与使

用,可以克服以上的缺陷,扩大其使用范围,为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据大兴安岭林管局森林经营局的初步估算,每年全区落叶松木材销售量为300万 m^3 ,按其中10%为白材落叶松计算,则每年销售白材落叶松木材为30万 m^3 ,如白材落叶松作为新材种,按优质优价分别销售,把白材落叶松木材价格在原价格上提高到每300元/ m^3 ,则一年可以实现效益9000万元之多。

在此期间,他又发表了“两种材色的兴安落叶松木材物理力学性质的研究”、“兴安落叶松白色材与樟子松的材性比较”、“两种材色的兴安落叶松木材的超微结构与木材分子的比较研究”和“白材落叶松的研究”4篇论文。详细报道此项研究的成果。

他的这项研究,旨在大兴安岭天然分布的落叶松种群中选出一个材质优良、生长迅速的新类型,为大兴安岭林区保护和培育有价值的经济树种提供科学依据。这项研究是他源于生产,服务于生产的典范。这一成果,获黑龙江省1999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六、当好期刊编委 热心学会工作

40多年来,黄普华教授不仅在教学、科研道路上,潜心探索,开拓创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在期刊的编委工作上,也倾注了他大量的精力。1964年,他被中国林业《林业文摘》编辑部聘为俄刊《植物学杂志》特约文摘员,负责将该俄刊杂志每期好的文章翻译形成文摘,刊登在《林业文摘》杂志上。1965—1966年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翻译了“卡查赫斯坦和顿河地区沙质土上欧洲赤松的根系”、“波尔斯诺依乌斯克尼依岛林分中的落叶松种子产量结构及自然因子对其影响”、“幼树在林冠下的光合作用”以及“母树根的分泌物和矿质养分对西伯利亚红松幼苗发育的影响”等7篇文章,一一做成摘要,先后刊登在《林业文摘》杂志上。“文化大革命”开始,该杂志停刊,工作也停止了。

“文化大革命”后,他先后任《植物研究》和《植物分类学报》编委。《植物研究》“文化大革命”前出了3期,1979年复刊。那时,正值《中国植物志》编研,很多新分类群亟待发表。仅在《植物分类学报》发表,已不能满足要求。经他代表《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向当时任《植物研究》主编周以良教授反映这一情况,并征得同意,将原来拟投《植物分类学报》的稿件投到《植物研究》,以减轻对《植物分类学报》的压力和《中国植物志》如期出版。黄普华教授在任编委期间,对稿件的退留、每个汉字、每个外文字母、每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特别是拉丁文描述,都一一审阅修改。他对人常说,在这10多年的编委工作中,他最大的体会是在工作中除了审查稿件的内容外,还必须在工作中坚持“两不相信”原则。所谓“两不相信”原则,就是说第一要“不相信专家教授”;第二要“不相信自己”。他的“不相信专家教授”是指有个别年轻同志,为了自己的文章能顺利发表,往往在脚注上写上“本文经某某专家、教授审阅”或干脆把专家教授的名字挂上。但经审查,问题不少,不像专家、教授看过,经详细了解,果真如此,专家、教授本人根本就没有看过这篇文章。这种事情给他最大的启示就是以后审查稿件不能因有某某专家、教授审阅字样,就马虎从事,要一视同仁,认真审阅。这就使他得出“不相信专家教授”的第一原则。当然,对专家、教授审阅过的稿件是可信的。第二“不相信自己”,他

的意思是说，自己看过第一遍的稿件，第二遍看时也会有错漏，特别是校对工作。所以，他又得出“不相信自己”的结论。由此看出他对编委认真负责的精神。“两不相信”原则，得到编审人员的认同。

他热爱学会工作。1984年，他在北京编研《中国植物志》时，与树木学几位同仁，向中国林学会提出申请，建议成立树木学专业委员会。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上级学会的批准。1985年在张家界召开了中国林学会树木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树木学学术会议，在会上他当选为第一届常委。1988年、1994年，他先后当选为第二届常委、副主任委员；第三届常委、副主任委员。在学会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为了能按计划进行学术活动，1990年他自筹经费，承担了全国林学会树木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召开。在会议期间，组织安排全体与会者参观考察东北林业大学凉水自然保护区。与会者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到东北红松阔叶林区。当走进红松阔叶林区时，他们除了相机不停地拍摄这大自然赋予人们原始旷世之美的景色，还认真考察、调研，收获极大。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全体与会者十分满意。他为活跃学会活动，促进学术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七、甘做人梯 培养青年教师

1958年黄普华晋升讲师后，他开始担任教研室主任的工作，一直到退休。在数十年岁月中，他承上启下，甘做人梯，为培养青年教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并形成了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法。这套方法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的工作：

（一）把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同培养结合起来，且坚持在工作实践中培养。

在培养青年教师中，历来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让青年教师脱产进修；二是把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同培养结合起来，并且坚持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回想起自己迅速成长的过程，正是前辈让他坚持在工作实践中提高的结果。因此，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他倾向采取后一种途径，为了在这方面做好培养工作，他努力做好以下具体工作。

1. 搞好传、帮、带，发挥老教师的作用。

在教学、科研的实践工作中，多给青年教师具体指导。在教学工作中，帮助他们理解、掌握教学大纲的要求、教材的体系、内容以及重点、难点等。同时，还具体帮助他们如何解决好教材、讲稿和板书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等问题。青年教师在他的精心扶持和具体帮助下，在业务等各方面提高很快，成长迅速。他们在讲课中能突出重点、难点，运用课堂语言，既精炼、清楚，又生动，受到学生的好评。他们教研室有两位青年教师在教学中先后获得学校教学质量优秀奖和教书育人奖。

2. 让青年教师多参加科研生产实践，鼓励他们多出成果。

他让青年教师除参加省、校课题外，每年还与生产单位联系，承担一些科研生产任务，让他们多参加和实践。仅自1988年以来，就先后完成4项横向联系的课题。在近3年中，两位青年教师发表论文就有21篇。科研活动的开展，大大提高了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青年教师迅速成长的过程证明，把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同培养结合起来，坚持在工作实践中培养，是一种出成果、出人才较好的途径。

（二）把校内培养同校外培养结合起来，博采百家之长，增强科学生命力。

当今的社会，是人、物、信息大量交流的时代。人们总是不断地汲取外界信

息,广泛交流,博采百家之长,避自家之短。这样才能保持思想上的生机和活跃;才能增强科学生命力。针对教研室青年教师多为留校任教的情况,为了弥补所谓“近亲繁殖”带来的不足,他采取了校内培养与校外培养结合起来。除在校内培养外,创造条件,让青年教师多走出去,一是让他们多参加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专业学习班、学术研讨会或专题研讨会,让他们更多地得到学术上的锻炼和提高;二是他出席一些国内学术会议,都要创造条件把青年教师带出去,同他们合写论文,让他们在会上宣读;三是有计划带他们到南北方林区考察,采集标本,接触实践。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不辞辛苦,爬山涉水,带领他们辗转于南北方各大林区,身教加言教,耐心细致向他们讲解。

每当青年教师随同他一起外出,只要是顺路,他都要带领他们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各地方植物所和兄弟院校参观学习,互相交流。尽管经费不甚富裕,但他们克服困难,仍要坚持这样走出去,确保这一计划得以实施。因为,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博采百家之长,学到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有利于交换信息,保持思想上的生机和活跃,增强科学生命力。

(三) 把言传与身教结合起来,发挥老教师的榜样作用。

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在培养青年教师的过程中,他同样严格要求自己,言传身教,从热爱教育事业,严谨治学的态度,诲人不倦的师德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道德诸方面,给青年教师做榜样。在论文署名上,不是以自己为主的工作他不署名;在安排各项工作上,做到胸襟坦荡,秉公办事;凡是计酬的,如函授、专业证书班的教学等,都先安排青年教师授课。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在青年教师中收到良好的效果。

八、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

黄普华教授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优秀共产党员。他作风正派,为人正直,乐于助人,与人为善,以忠诚教育事业为己任,爱岗敬业,任劳任怨;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思索取,甚至不计个人安危,一心扑在工作上。下面几个例子,便可见点滴。

其一,在研究樟科植物时,他发现1901年德国学者Diels发表的*Lindera pedunculata* Diels种与1941年美国学者C. K. Allen发表的*Litsea merrilliana* Allen种是属于同物异名,不过前者并非*Lindera*属,而确是*Litsea*属。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将对Diels定错属的种组合为*Litsea pedunculata* (Diels) Yang et P. H. Huang。在深入研究后,又发现他的前辈杨衔晋教授在1945年发表的*Pseudolitsea tsaii* Yang种也是*Lindera pedunculata* (Diels) Yang et P. H. Huang的同物异名。当时杨衔晋教授以这个种为模式建立一个新属称*Pseudolitsea*。

大量标本研究证明,*Litsea pedunculata*这个种花的雄蕊与花被数目变化较大,而且往往不稳定,有前者增多而后者减少或后者增多而前者减少的趋向;药室瓣裂也有畸形的现象。当时,杨衔晋教授是根据这种变化和畸形的少量标本建立这个属,显然是依据不足,应予取消归并入*Litsea pedunculata* (Diels) Yang et P. H. Huang种内。

当时,他曾想过,要取消前辈的种和属,会不会引起前辈的不高兴呢?然而,他又想到,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就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不能丝毫有别的想